

古城铁钟的千年沉浮

程涛

在金堤河畔,鲁豫两省交界之处,坐落着一座依堤傍水、风景如画的小镇——莘县古城镇。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夏商周三代,便是古顾国的所在地。

历史的长河曾在此留下诸多璀璨印记。孔子的得意门生仲由,曾在此筑堤修书,并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百里负米奉亲”的故事,其孝行千古传颂。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于1742年至1746年间在此担任县令,为官期间的种种事迹至今仍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

古城镇内有很多历史遗迹,仲子庙、舍利寺、秦皇堤遗址无一不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然而,在众多古迹之中,最引人瞩目也最具价值的当数金代铁钟。这口铁钟铸造年代久远,保存状况良好,工艺精湛绝伦,形制硕大雄伟,在聊城乃至山东省范围内都独一无二,堪称瑰宝。

关于这口金代铁钟的来历与形制,1935年刊印的《续修范县志》内有明确记载:“大钟在来钟寺,今移中山园。高九尺六寸,围十九尺五寸,上部厚八寸,下部厚二寸四分。承安四年(1199年)六月初六日铸造。”如今,文物部门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精准测定,得出该钟通高2.9米,底部直径达1.77米,上部厚度为9厘米,下部则厚7厘米,重量更是高达4000公斤。不可否认,古今数据之间存在着些许偏差。毕竟,之前受制于简陋的测量工具和有限的技术水平,其测量的精准度远不能与现代相提并论。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汹涌的黄河水冲毁了位于金堤南的范县县城。时任范县县令张允当机立断,决定将治所北移二十里,至金堤外的旧兵寨处,也就是如今的古城。古城内原有一座文殊寺,不幸毁于战火硝烟之中,唯有那口大钟留存于世。百姓见大钟孑然伫立,寺院却已了无踪迹,故而衍生出此钟系自山西洪洞县广济寺顺黄河漂流而来的传说。

据传,这铁钟原本悬挂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广济寺内。清顺治八年(1651年),洪水肆虐,滔滔洪流之中,大钟被吊挂钟体的巨型木架稳稳托起,顺着汾水悠悠而下,而后融入了奔腾不息的黄河。一路漂泊辗转,跨越重重险滩急流,最终奇迹般地抵达范县。这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不断添枝加叶,使范县的百姓惊叹于这铁钟的非凡来历,深信这是神意的眷顾。最终,大

家怀着无比庄重崇敬的心情募捐建寺,并将这口意义非凡的大钟郑重地悬挂起来。这座因钟而建的寺院,也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来钟寺”。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考古发现,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1975年,在平整土地时,人们在古钟所在地周围意外挖出了一些化铁水用的坩埚以及铸锅用的泥范。仔细观察,泥范上残存的花纹字迹竟与钟体上的别无二致。由此可见,这口大钟实则是就地铸造而成,自铸成之后并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移动,可见,传说并不属实。

那么,这样神奇的传说究竟因何而生呢?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探究,我认为或许与元末明初时期从山西向外的移民活动有着紧密复杂的联系。

根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百姓不仅饱受战争的摧残,还频繁遭遇水、旱、蝗、疫等天灾的侵袭,长期的动荡不安导致山东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彼时的中原大地,在战乱与天灾的双重打击下一片萧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原本肥沃的土地因劳动力的匮乏而日渐荒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凭借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峻的独特地理优势,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得以独善其身,保持了相对的安宁。那几年,当地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百姓衣食无忧,生活相对安定富足。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因久经战乱,大多沦为荒无人烟之地。为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以稳固明王朝的统治根基,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果断推行移民政策,多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向中原及周边地区大规模迁民。

据《洪洞县志》等诸多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官府为了有序推进移民工作,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移民标准:“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其余之人则必须遵循律法,背井离乡。而且,所有外迁的民众都需前往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再在官兵的监护下,从寺前那棵见证无数悲欢的大槐树下启程,奔赴未知的远方。

明初移民虽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多种形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招诱与征派等强制手段。

著名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直言,明初移民是强权胁迫下的产物,迁令一出便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官府只得通过警告、刑罚等手段强制推行。“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愤。惧之以戒,胁之以剿刑。”寥寥数语,便将移民之初民众的哀怨愤懑,以及官府的强硬逼迫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押运途中,为了杜绝移民逃脱的情况发生,官兵们采取了极端的手段,用绳索将移民们逐个牵连捆绑,这使得移民们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长时间处于被捆绑的状态,当他们想要通过警告、刑罚等手段强制推行。“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愤。惧之以戒,胁之以剿刑。”寥寥数语,便将移民之初民众的哀怨愤懑,以及官府的强硬逼迫刻画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由于移民途中的条件异常艰苦,缺医少药的状况极为普遍。再加上长途跋涉所带来的劳累劳累,以及各种疾病的频繁侵袭,移民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死亡率居高不下。许多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在这漫漫迁徙途中被迫离散,亲人们从此天各一方,难以相见。

此外,明朝统治者出于稳固中央集权统治的考量,深恐同族聚居会逐渐形成强大势力,从而对其统治地位构成潜在威胁。为此,他们特意在移民政策中制定了一条严苛的规定:“同宗同姓者不得同迁一地”。这一无情的政令,使得无数骨肉至亲被迫分离。

相传,曾有兄弟四人面对即将到来的长久分离,心中满是悲感与不舍。为了日后能够相认,无奈之下将家中的铜香炉砸成四块,兄弟四人各执一块,以此作为重逢的信物;还有一位母亲咬破孩子的脚趾,用那深深的伤疤作为日后相认的暗号。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饱含着移民们在那段沉重历史中所承受的无尽痛苦与深深无奈,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们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对亲情的无比珍视以及执着坚守。

中国人向来怀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和安土重迁的情怀,寻觅精神家园的内心渴望,从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

山西洪洞的大槐树,静静矗立在广济寺旁。寺内曾经的晨钟暮鼓,余韵悠

长。它们不仅是移民们对于祖居之地的浅淡回忆,更是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变迁,化作了人们对故乡和祖先的深切眷恋与无尽缅怀。

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中,那口铁钟自山西洪洞县广济寺顺黄河漂泊而来,一路上,它在湍急的水流中沉沉浮浮,恰似那些背井离乡的老百姓,在命运的洪流中历尽艰辛,藏着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牵挂。

可别小瞧这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山西移来者”的故土情结影响深远。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进入山西地区。部分士兵行经洪洞县大槐树附近时,竟纷纷下马,虔诚跪拜。李自成察觉后,拿几个带头违纪的小头目问责。一番详细询问后才得知,原来这些士兵皆为“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时的“混乱”之举,实则源自内心深处对家乡炽热而真挚的拳拳深情。李自成了解其中缘由后,被这份乡情打动,不仅未予治罪,反而特批放假三天,让将士们得以寻亲访友,重温那浓浓的乡情,聊解思乡之苦。

时光流转至1911年底,北洋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的部队南下镇压山西革命军,一路上烧杀抢掠,恶行累累。然而,当他们行至洪洞城外,望见那棵巍峨的大槐树时,竟然集体放下手中武器,折下槐枝当作香火,齐齐下跪参拜,将洪洞视为自己的“老家”。此后,部队军纪肃然,不再对当地百姓造成伤害。

这份对故土的情感力量之强大,令人惊叹。它神奇到足以让军纪严明的队伍流露柔情,也能让军纪败坏的部队收敛恶行。正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份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情的渴望,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天性。

即便时光流转至今日,洪洞大槐树景区仍是无数移民后裔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他们不远万里前来寻根溯源。“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传唱了六百多个世代的民谣,如同一条温暖的纽带,串联起无数中原儿女对往昔故土的深沉眷恋,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的文化符号。

而钟,作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跨越时空维度的古老器物,其承载的象征意义丰富且深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同理,“今人不闻古时钟,今钟曾经唤古人。”钟声悠悠,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尤其对于漂泊天涯的游子而言,记忆中那熟悉的钟声早已成为他们心灵的慰藉。每当听闻那钟声,就仿佛能与早已离去的先人对话,能与分隔两地的亲人相拥。这钟声,跨越了古今的界限,超越了空间的距离,在他们被乡愁紧紧缠绕时,成为了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这也是人们愿意相信“钟从故乡来”的缘故。

而古城镇的这口铁钟,不仅有故土传说,更铭刻着家国情怀。

1944年12月,日军发动“12·12大扫荡”,扑向范县等地抗日根据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近穷途末路,国内物资匮乏,见到大型铁器就想掳去造军物资。寿张的日军盯上了来钟寺的大铁钟,用老牛和木板,好不容易将钟弄上汽车。当欲运往寿张时,怪事发生了,汽车发动机轰鸣,却怎么也爬不上并不高的大堤。日军加挂三头老牛,车才爬到半坡。此时铁钟晃动,麻绳断开,铁钟滚回堤脚。日军再次套绳,铁钟却纹丝不动。

于是,气急败坏的日军打算用手榴弹炸钟。巨响后浓烟升腾,钟鸣声震数里。天空中云雾骤起,似有巨龙,接着风雪交加。迷信的日军以为触怒神灵,仓皇逃走。之后村民发现钟仅有一爪被炸损。这口铁钟如同一名坚毅的战士,以千钧之躯守护着脚下的土地与民族的尊严,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

当地还流传着一则奇事。2002年,古城镇政府筹资建钟亭,移钟入亭那天,大钟刚被吊车吊起,突然涌起遮天大雾,将吊车和钟亭都笼罩于其中。操作员紧张之下,对着大钟双手合十拜了拜才继续工作。等大钟缓缓放下,一阵大风刮来,雾气瞬间消散,阳光洒满钟体。很多目击者都能证实,吊钟时确实起了雾。不管这是巧合还是有别的原因,都为这口古钟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为古城的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为了最大限度地留存铁钟的历史与时代价值,2020年12月,相关部门为铁钟加装了坚固的六边形钢化保护罩,并设立醒目的保护警示标识,时刻提醒人们珍视和守护这份历史的馈赠。

考古视野下的中华马文化

刘文涛

2026年是丙午马年,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在六畜中马居首位,在传统文化中,马的象征意义也多是正面形象。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四千年前黄河上游的甘肃地区已经出现了驯化家马。在此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马已成为人类行旅代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帮手。下面根据考古出土材料,来谈一谈与马相关的故事:

千乘鸣嘶

先秦时期,马不仅是交通运输工具,马匹的多少还代表着一国国力的强弱。文献记载的“千乘之国”,也不是简单千辆车与千匹马的组合,而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体现。当时以四马一车为一乘,驾车的四匹马,中间二匹称“两服”,左右外侧二匹称“两骖”。《诗经·郑风》中有“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的诗句。意思是驾车的中间两匹服马抬起头,两侧的骖马比服马稍后,排列如雁飞之行列。从诗句描述中能看出四匹马拉车的组合位置。这四匹马合称“骖”,成语中“骖马难追”的“骖”就源自这里。

先秦时期,高等级贵族死后大多以车马陪葬。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级别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车马坑是邹平长安遗址出土的一号车马坑。一辆车,四匹马,正是一乘。每匹马身上都配备了青铜马胄、马镡、马衔、络饰、胸饰,马尾上有精美的海贝装饰。出土文物中,銮铃是西周时期马车上的必备器物,由铃铎、铃颈、銮座组成,它通常安装在车辕或衡木部位,当车马行进时,铃铎碰撞铃腔发声,声效类似鸾鸟鸣叫,用以警示行人并安抚马匹,具有装饰与实用双重作用。衔和镡是连在一起配套使用,衔在马口中,镡在口外,口两边一边一个。镡的末端与车马的缰绳相连,目的是控制马行进中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马嚼子”。

当时,战马在作战前都要把尾巴打个结。这是因为马在战场上快速飞奔时,马尾巴扬起时也会影响战车里作战人员的视线,耽误战机。同时尾巴巴乱甩,到处乱飘,也容易缠绕住其他东西。但马尾巴有实际作用,不能剪掉,因此在上阵前,都要把马尾打结。《左传》中记载的齐晋鞍之战,就是因为战前没有把马尾巴打结,而酿成了大祸: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派郤克率八百乘兵力联合鲁军追击齐师。双方在鞍地(今济南黄冈、北马鞍山一带)决战。齐顷公轻敌冒进,晋军主帅郤克虽中箭负伤仍坚持击鼓指挥。晋军士气大振,齐军崩溃,仓皇东逃,晋军穷追不舍。从现在济南北边黄冈跑到东边华山,围着华山转了好几圈还是不算完。给齐侯驾车的逢丑父和齐侯换了位置,以便不能逃脱时蒙混晋军。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齐侯的车子快到华泉的时候,两旁驂马的尾巴又被树枝挂住。齐侯的“司机”逢丑父因手臂有伤,不能下车推车,被晋军的韩厥赶到车前,想俘虏齐侯。因之前逢丑父与齐侯调换了位置,韩厥把逢丑父当成齐侯给俘虏了。齐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因素很多,但在逃跑时,驂马尾巴没打结被树枝挂住导致车不能行,无疑是致命的。

骅骝绝尘

骅骝战车虽称雄于先秦时期,但它本身也存在很多弱点。首先是车体笨重,容易损坏。同时驾驭困难,御者靠双手执六轡,要专门训练。战场也只能选择在空旷平坦的原野,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笨重的战车就无用武之地了。在战斗中,也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俘获的事例。到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弩的使用,也对车战极为不利。加之新兴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车战日趋衰落。赵国的赵武灵王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有了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

秦汉时期,骑兵作战的时效性和机动进攻转移速度凸显。单骑驷马战车彻底失去作为军队主力兵种的地位,退出战争舞台。但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一直以农耕为主,农民并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从小就进行骑行训练,其骑射水平当时是低于北方游牧部落的骑兵。这些问题改观从秦汉开始,直到魏晋十六国时期才基本完成。改变这种局面的是当时的马政和新马具的发明改良。

西汉初期,马匹短缺加之中原马匹在体型和速度上难敌北方游牧部族的战马。为解决这一问题,汉高祖时建立了严格的马匹牧养和管理制度,吕后时期更是禁止母马流出,以保护国家军事资源。汉文帝时期,晁错建议通过“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以减轻国家养马负担,通过免役政策推动民间养马之风的复苏。汉景帝时期,实行了“马驾

关”规定,限制马匹规格,扩大边境牧马苑,进一步扩大军马资源。到汉武帝时,一个宏伟的战略得以推行:不仅要击退匈奴,更要主动打通西域,引入良种名马,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张骞“凿空西域”,河西四郡相继设立。他听闻大宛有汗血宝马,不惜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远征,终得宝马三千。这些来自西域的马,蹄质坚硬耐磨,体型高大,更善走平稳的“对侧步”,是装备重甲骑兵的理想选择。

新马具的发明改良主要是指马鞍与马镫。众所周知,马背呈“两面坡”,尤其是马在奔跑或跳跃时,人骑在上面连稳定都很难保持,更不用说再挥动武器或射箭了。所以说骑马离不开鞍具,鞍具是否完备,直接影响骑马人的舒适度和持久性。最初并无鞍具,骑手直接骑在马的裸背上。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皮质或其他材质的坐垫或软鞍。软鞍的使用,确实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骑手臀部与马背的摩擦,为骑手提供了些许缓冲。两汉时期,这一类型的软鞍盛行。2006年,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中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马背上绘一块红边白地的毯状物,在其上放置软鞍,并通过一根红色腹带固定。东汉末至三国初期,出现了高桥马鞍。高桥鞍除了能给人稳定的依托,还能减轻马匹的不适。这种马鞍骨架结构包括前、后鞍桥以及两块鞍座板,均为木质。鞍下与马背接触面还有一层软垫,这就是鞞。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描述木兰替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鞞。”说明在北朝时期,鞍鞞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

马镫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人甚至说马镫的发明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在没有马镫的时候,骑马是一件苦差事,当快马疾驰时,骑手坐在马上,脚是悬空的,只能双脚夹紧马身,并用手紧抓缰绳,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大约在汉魏时期,开始出现了原始马镫。马镫和马鞍是相辅相成的,有了马鞍,从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带,下端结成圆形套扣,作为上马时蹬踏之用。因只有一只,又谓之“单镫”。单镫的出现改变了此前上马时需要按住马背一跃而上的方式,但单镫还存在一个平衡问题。但从考古现来看,江苏南京东吴丁奉墓和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中出土骑兵俑还都是单镫。到了十六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双镫。考古发现的青州体育场墓葬、北票冯素弗墓等十六国时期墓葬中都出土了双镫。青州体育场墓葬出土的马镫是铜铸,镫柄上部有一小孔,小孔以下依次篆刻有三角纹、龙纹、环纹上篆刻一周忍冬纹。冯素弗墓出土的双镫是用桑枝揉木为镫后外包鎏金铜片。由单镫发展成一边一镫,从而进一步解放出骑手的双手,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完成冲、刺、劈、击等动作,大大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同时又能有效保护骑马人的安全。马镫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对骑兵历史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骅骝颂歌

古代的马在人类社会中承担着不可缺少的功用。驾驭马车的技能练习在周代已上升到贵族层面。当时贵族教育六艺中的御,就是驾驭马车的技能。东周时期盛行的大田之礼,是以田猎形式进行军事演习,兼具军事检阅与法律制定功能,促进了马镫的诞生。到了汉代,随着对马匹需求的扩大,与之相应的马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表演为目的的马术运动——马戏也经常出现在杂技表演和娱乐活动中。从考古发现来看,最精彩的莫过于于阗南北赛画像石墓中的马戏表演。表演者在两匹四蹄腾空,相向飞奔的骏马上,一人站立在马背上,手挥长鞭,另一人在马背上呈倒立状态,手里还拿着兵器,看起来精彩而又刺激。

唐代承袭汉代传统,注重培育良马,供军事之需。同时社会开放,歌舞盛行。舞马这一娱乐形式在唐代风靡一时。唐玄宗时期每逢千秋节庆典,数百匹身披锦绣、佩戴金银饰物的舞马随《倾杯乐》起舞,完成衔杯跪拜、登床旋转等高难度动作,形成“舞马衔杯祝寿”的经典场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此景,曾创作过流传千载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金器窖藏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壶腹两侧各篆刻一匹鎏金舞马,马匹后腿屈坐,前腿直立,鬃毛披散颈部系飘带,口衔酒杯呈跪拜姿态,极尽生动奢华之美。

数千年来,马被赋予了勇往直前、自强不息、忠心耿耿等多重精神品格。飞驰的骏马,作为奋发向上的文化意象,在中华文明中长盛不衰。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当下的生活中,马的形象始终散发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时隔丙午马年,让我们以龙马精神迎接接下来的每一个挑战,以马的勤奋与坚持,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